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2013新境界 中国龙 中国酒

一群公民的“立法”尝试

本报记者 张 国摄

会牵我心

本报记者 张 国 刘世昕

烫着卷发、个头矮小的学者解焱激烈地反对国家的一项立法计划。不过，她的反对不是说说而已——过去一年里，她联合100多位志同道合者，起草了一部完整的“法律”草案，希望取而代之。

2013年全国两会前夕，这位46岁的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将一份80多页的立法建议书，包括写有92条“法条”的草案和研究报告，交到了17位全国人大代表和10位全国政协委员手中，试图通过他们影响立法进程。

其中的绝大多数人，她压根儿就没见过。3月1日，当她首次尝试在一间教室里为这些天南海北的代表和委员开一次说明会时，还闹了个笑话：她连自己请来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赵进东都没能认出来。饿着肚子赶到的赵院士当时就在她的眼皮底下悄悄吃着盒饭，而她还焦急地致电，催促这位素未谋面、但强有力的支持者尽快到场。

“过去一年我们真的说服了好多人。”解焱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她希望这些人一鼓作气，推动国家“把法律立起来”。

尽管她对此表示乐观，结果却难以预料。她反对的《自然遗产保护法》2008年开始起草，已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在今年一份最新报告中，全国人大环资委表示，“国务院绝大多数部门已原则同意《自然遗产保护法》草案的内容，立法条件基本成熟”，建议将草案列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日程。

《自然遗产保护法》旨在保护自然生态中最珍贵、在国内外具有突出价值的部分。然而解焱和她的同道中人认为，这只是一部“狭窄的”、只面向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法律，不能涵盖森林公园、湿地公园等同样提供重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区域，捍卫不了中国生态安全的底线。

她形容，一旦通过，在600个保护地受到保护的同时，会有7000多个保护地处于危险之中。

《自然遗产保护法》草案的审议一拖再拖。解焱相信这与他们的反对有关。去年两会前夕，她紧急联络了不少人，呼吁延迟审议，其中包括两位人大代表。

在延迟审议后，他们还联络了260多位学者联名致信全国人大，指出其中的缺陷。

解焱作为副研究员的工作计划也被延迟了。2012年两会过后，她发起了民间的“自然保护立法研究组”——“这个研究组就是奔着两会来的，当时的最终目标是要上两会，提提案、议案。”

解焱对记者说，作为公民，既然反对一项立法，“你总得给国家建议一个才行”。

当她提出要起草《自然保护地法》时，成都观鸟会理事长沈尤十分意外。他对记者形容，“她一下子把我们打晕了”。

还没有人做过这样的尝试。这项研究持续了近一年。从事生物多样性保护19年的解焱是总协调人，她一年内走访过10多个保护区，问卷收了几千份。与她共事的是100多位成员。

在最终建议书里，这个研究组指出，中国的各类自然保护地分属林业、环保、建设、农业、国土资源、海洋等十几个部门管理，行政壁垒明显，保护不力，亟须一部综合法律统领。

他们建议，将这些保护地按照保护严格程度分为4类，分级管理，实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整体保护。经过反复计算，他们认为按照这种模式，投入20万左右的工作人员，拿出全国生产总值0.065%~0.2%的经费投入，就能在17%的陆地和10%的海洋区域建立自然保护地，捍卫“美丽中国”的生态安全底线。

在难以计数的修改之后，解焱认为，他们的建议书，令很多代表“无法拒绝”。

过去这一年里，他们从没停止过对决策者的游说。他们给十几个国家部委的有关司局发信，邀请他们开“部委座谈会”和“专家座谈会”。这类座谈会开过几次，每次都“交锋激烈”。有七八个部门派人参加过。也有部委客气地表示对他们的研究“很有兴趣”，但“没时间”与会。

研究组成员陶蓓说，在这些会上，他们坐在一旁观看解焱“舌战群儒”，都觉得她“好可怜”，被这么多人“围攻”。

总体来说，解焱虽然“蛮受打击的”，但感觉“他们的态度在逐渐转变”，从最初询问“自然保护地”跟“自然保护区”的区别，到慢慢接受自然保护地的概念。越往后，开这类会就越顺利。

当新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产生，这支民间团队几乎发动了所有能动员的力量，请代表、委员给国家“捎话”。

解焱向积攒的4000多个电子邮箱里群发了邮件，并在社交网站上传播自己的主张。大多数邮件如石沉大海。也有一些人简短回复她：“谢谢，收到。”在解焱看来，这已经“特别好”了。

她觉得，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多是层次高、时间少的人，不能奢望他们都参加这样一个民间的研究项目。他们尽量通过朋友介绍这些人，只要对方有意，就把研究报告发过去。

一些人令她特别感动。她的顶头上司、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方新收到材料之后，给她打电话，深入了解此事的背景和研究内容。北京市科委主任闫傲霜按照格式，帮他们修改过草拟的“议案”。

湖北省政协副主席、湖北经济学院院长吕忠梅，在上届人代会上曾与30名人大代表一起提出《自然保护区法》的议案，但未能进入立法程序。她表示，愿意在解焱等人的研究上继续提出议案，“为子孙后代留下空间和资源”。

来自香港的全国人大代表蔡素玉说，咱们国家本来是一个生态多样化的大国，但近二三十年来，国家环境被破坏的程度实在使人痛心。以自然保护地为例，讲了多少年，至今仍然没有一部法律可以使我们有效地保护日益被破坏的所谓“保护地”。国家应该马上为此立法，再拖也不能迟于明年。“更何况现在已经有民间团体做了一个非常详细、非常全面的‘法律’草案可以作为蓝本。”

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忠和表示，自己愿意联名提案，因为“自然保护地在当今中国，得到无论多高的重视都不过分”。

解焱没有想到“效果这么好”。他们原本预计，能争取5个省份的全国人大代表提交议案就是胜利。而现在，有13个省份的代表表示愿意。致公党中央向全国政协提交的提案中，就包括《关于提高自然保护地管理效率，捍卫中国生态安全底线的提案》。

这是解焱作为致公党党员撰写的提案。

她本人还是北京市朝阳区政协委员。她在区政协会议上，提过区里的绿化保护问题，没有提过自然保护地问题，因为在她看来，这个问题不是朝阳区的，而是全国的。

很多人不理解她一年来的举动。包括陌生的网友在内，有太多人告诉她，她的努力是“没用”的。在她发起的自然保护立法研究组内部，也不时有成员退出。有人给她写信表示，“完全不同意”她的做法。因此，她“偶尔也会有受打击的状况”。

不过她也表示，自己作为公民的事情已经做完了，剩下的，是“国家的事儿了”。她希望今年两会能使自然保护地问题“尘埃落定”，启动调研和立法。

她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到野外，探望自己过去19年里结识的老朋友：东北虎、藏羚羊、扬子鳄、雪豹、斑鳖，还有马可波罗羊。

本报北京3月4日电

柔声传递大国音

本报记者 丁先明

“是她！”3月4日11时05分，当外交部副部长傅莹走进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发布厅时，一个满怀期待的香港记者马上发出确认信息。

一袭宝蓝色风衣与银发交相辉映，黑色镶金珠项链更显时尚典雅。这名全国人大首位女性发言人一经亮相，便收获了此起彼伏的快门声。

“刚才来得稍微晚了一点，因为是从大会那边过来的……我这个新手要找到路也不是那么容易，抱歉。”用温文尔雅而不失幽默的开场白，这名蒙古族副外长开始了自己在人大发言人岗位上的首秀。

面对台下每名记者的提问，这名60岁的女发言人始终保持微笑，眼睛注视着提问者，不时转动着手上的铅笔，把问题要点记录在案。

回答问题时，傅莹喜欢打比喻、讲事实，娓娓道来，没有官腔。当涉及国家利益时，她的语气会变得坚定有力，同时不失女性柔情。

有记者提出“全口径预算”的问题，这名叱咤国际风云的女外交家马上谦逊而诚恳地说：“全口径预算决算的概念，我也是刚刚学习了解的。”

这种平和亲切之风，傅莹保持全程。即使面对日本记者“中国外交是否会更加咄咄逼人”的硬问题，她依然不愠不火，语速适中，甚至没有提高声调。

阐述完中国的外交政策后，傅莹甚至与这名日本记者开起了玩笑，“刚才你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注意到中国记者都笑了”。

“中国人经常讲‘一个巴掌拍不响’，要双方都有这样的(和平)意愿，如果对方选择强硬的举措，选择的是背弃共识的做法，那么中国还有一句话叫‘来而不往非礼也?。”傅莹仍报之以友善的微笑，只是绵里藏针。

当被问及环境问题，满头银发的傅莹马上表现出生活化的一面，更显亲切平和之风。“现在生态和环境确实成为广大人民群众非常关心的问题。”她举例说，自己每天早上拉开窗帘都要看有没有雾霾，她家有两个口罩，女儿一个，她一个。

在不到60分钟的时间内，这名干练的外交官高效地解答了8个问题。最后一个提问的权利，傅莹将机会留给了自己的老朋友——美国CNN记者吉米。她还不忘和这位喜欢提棘手问题的外国老朋友开玩笑：“问题不要太尖锐。”

吉米保持了一贯的尖锐风格，向傅莹抛出政治改革的问题。“我今天问的(政改)问题非常难，但傅莹回答得很不错。”听完回答，这名CNN资深驻华记者不吝溢美之词，“在政改方面，中国应该探索自己的模式，而不是照搬别人的模式，我非常同意她的观点。”

亮相前，傅莹承载了来自各方的期待。她在外交舞台上活跃多年，历任驻罗马尼亚使馆随员、驻印尼使馆参赞、驻菲律宾大使，随后成为中国首个驻西方大国的女大使——先后出使澳大利亚和英国。

不管是外交官，还是媒体记者，大家似乎都能讲出一段关于她的故事。曾经，有外国元首盛赞傅莹是“最能清晰传递中国声音的使者之一”。

出使澳大利亚期间，傅莹应邀做一场关于中澳关系的演讲，竟然有550多名听众自掏腰包闻讯赶来。主办方对傅莹开玩笑说：“比尔·盖茨来墨尔本演讲时都没有这么多听众，看来你的魅力超过了盖茨！”

在中国外交界，傅莹素有“危机大使”之称。担任驻英大使期间，伦敦发生北京奥运火炬传递风波，傅莹两次在英国主流媒体发表文章，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开创了大使为驻在国媒体撰文先例的先例，赢得了广泛赞誉。

在外交场合，傅莹让人难以拒绝的柔性表达方式，以及独特的气质和个性的语言，往往能征服老外，从而一改往日中国官员“不苟言笑、铁板一块”的形象。每当中国的对外宣传陷入被动时，总会有人感慨：中国的傅莹太少了！

虽然只与傅莹有过一面之交，但香港《东方财经》杂志主编助理钟中对她印象深刻。“她英语说得极好，交流方式非常国际化，言语亲和，又很有内在的东西，而且没有一点儿架子。”

发布会结束，这名香港记者整体表示满意，但他认为傅莹应该可以做得更好，这次“可能是因为她对国内问题，特别是经济问题，还不是那么了解”。

来自日本亚洲通讯社的记者徐静波给傅莹打了80分。“她唯一失分的地方，在于对国内问题不太熟悉，随着逐步了解，我相信她会做得越来越好。”

徐静波尤其欣赏傅莹对钓鱼岛问题的回应。他认为，傅莹的回答，既表明了中国的坚定立场，又不失女性的柔和，“启用她当人大发言人，是中国外宣上的一个成功”。

“我们有13亿人民，13亿人的智慧和勇气足以使我们能够克服困难、能够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能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傅莹用这句话结束了自己的首秀。说这句话时，她在发布会全程唯一提高了一次声调。

本报北京3月4日电

3月4日，江苏代表团全体会后，有记者问全国人大代表、铁道部部长盛光祖：“你是不是最后一任铁道部部长？”盛光祖表示：“我现在也不太清楚，是不是最后一任不重要，关键是根据国家的需要。我个人支持大部制改革！” 本报记者 陈 剑摄

检察官委员提出150个立法建议

本报记者 王烨捷

他说起话来语速极快。“预防腐败要出台行政组织法、行政程序法、国家公务员从政道德法、国家公务员财产申报法；惩治腐败要有反贪污贿赂法、反挥霍浪费法、司法责任法；廉政监察立法要有监督法、举报法、新闻法、申诉法。”

一口气，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巩富文嘴里冒出了11部需要从国家层面制定的、与反腐有关的立法。这次参加两会，他带来了13件有关立法方面的提案，其中6件涉及到反对贪污腐败。

30年间，巩富文先后为国家相关立法机关撰写、提出过150余个立法建议，只有不多的几个得到采纳并落实。“1987年提过司法责任制度，1998年被高检、高法采纳；14年前提了15部反腐立法建议，现在《行政许可法》、《公务员法》已经得到落实。”说到这里，巩富文笑了两声，“虽然大多数建议可能暂时落实不了，但我已经‘习惯’研究反腐立法了，也是一种乐趣。”

令他印象最深的是《申诉法》的建议草案，当时受全国人大法工委的委托，从事《申诉法》立法研究，至今23年，尚未有该法出台的时间表。

巩富文说，吏治腐败和司法腐败是最大的腐败，也是当下最应受到重视的问题，因为它们会危及全局，“尽管很多立法还没跟上，但我还是要研究，还是要提。”

在检察院，巩富文负责“嫌疑人批捕”工作，一件件令人唏嘘的案件敲打着他的心，有时“很疼”，“一些个人能力突出、业务成绩很好，应该是很有前途的官员，因为不懂法，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而‘倒下’，实在可惜。”

一个铁路系统专科学院的院长，50多岁的年纪，教育业务做得也很好，竟被检察院批捕。遭到逮捕后，该院长还一度认为检察院抓错了人，“他和财务处长一起去国外考察学习，用公款买了8万元的东西回来，被举报了。”

巩富文说，这位院长多次抗诉，“因为他觉得出国是帮公家办事，买了东西也是回来帮学校做人情的，不可能被判刑。”

另一个交通系统的领导，60多岁，已经张罗着退休了，却因受贿1000万元被检察机关逮捕，后来被判了无期，“他拿钱、拿东西已经习惯了，自己不觉得是犯罪。”

说到这里，巩富文再次强调了“预防腐败”立法的重要性，“如果有一整套制度防止他贪污受贿，对官员也是一种保护。”他透露，陕西省人大常委会今年可能准备出台《预防职务犯罪法》，探索如何从立法层面“保护”官员。

本报北京3月4日电

“天宫二号”可能与“天宫一号”比翼双飞

本报记者 张 国 原春琳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载人航天总设计师周建平今天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天宫二号”预计将在两年左右的时间内发射，由于“天宫一号”状态良好、可能延期服役，不排除会出现两座中国“天宫”并存太空的情况。

作为我国首个目标飞行器和空间实验室，设计寿命为两年的“天宫一号”于2011年9月29日发射升空。周建平告诉记者，迄今为止，“天宫一号”状态很好，所有设备工作正常，尚未使用当初设计的冗余备份设备，资源也比较充足。“我们预期它应该可以持续工作超过两年，甚至超过更多的时间。”

根据已经公布的计划，今年6月至8月，新一批航天员将乘神舟十号飞船，进行载人航天交会对接。周建平说，此次对接之后，“天宫一号”不会再与其他的载人飞船对接。但是，“天宫一号”将会继续用于科学实验。我国将借此进一步考核航天器领域的一些技术，包括产品的可靠性和寿命等方面的技术。

他说，我国今后将要建设一个长寿命的空间站，会比“天宫一号”寿命长得多。在太空里，由于高低温、真空、辐射等环境因素，维持长寿命是个复杂问题。何况，航天器由数以十万计的零部件构成，要保证长期不出问题，是一个重大的工程问题。在这方面，“天宫一号”表现得很好，持续了更长时间的飞行，积累了很多有益的经验。

据周建平介绍，“天宫二号”作为目标飞行器，原本是“天宫一号”的备份。但在神舟九号与“天宫一号”对接之后，“我们认为已经完成了交会对接的技术突破和飞行验证的任务”，因此，“天宫二号”的备份任务不再需要，任务调整为，在此基础上进行适应性改装，执行空间实验室任务，这样可以节省一艘飞行器。

他说，与“天宫一号”相比，“天宫二号”针对新的任务，进行的技术上的适应性改造包括布局和功能上的一些改造。“天宫二号”的目标主要是验证空间站的部分新技术，比如，我国将给“天宫二号”进行推进剂的补加，为此“天宫二号”将增加以前没有过的推进剂补加系统。他形容，推进剂补加的作用“就像飞机空中加油一样”，使用货运飞船把推进剂运上太空，然后通过一套自动系统，把推进剂从货运飞船输送到“天宫二号”。补加系统的原理与空中加油是完全不同的。

周建平说，在太空环境中补加推进剂对我国是一个新的重大关键技术问题。我国的这项研究已经开展了相当一段时间，“关键技术攻关进展得非常好，我们有信心把这件事情做好”。

周建平说，中国的货运飞船基于神舟飞船和“天宫一号”的技术而研发，主要用途是运输货物，要求可靠、高效、经济、多功能。货运飞船运输的货物包括空间站建造和舱外科技实验的一些设备。

他透露，两年左右后，我国将先发射“天宫二号”，货运飞船应该在“天宫二号”发射半年后发射。货运飞船的名字“应该快要公布了”。

针对外界传言的“天宫三号”消息，周建平澄清说，我国从来没有宣布过建设“天宫三号”计划。在“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任务完成后，我国就将进入空间站的建设阶段。

他告诉记者，神舟十号的航天员仍在选拔中。随着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持续发展和空间站的建设，飞行密度将会增加，会有更多的载人航天飞行机会。而飞行任务的变化，也会使我国需要不同种类的航天员。不同类型航天员的选拔标准不同，涉及身体素质、操作技能、专业知识等多种因素。今后将需要工程师和科学家进入太空工作。

本报北京3月4日电

环卫工代表希望环卫工变少

新面孔

本报记者 王怡波

谢智波的衬衫白得晃眼，与他黝黑的肤色形成鲜明反差。鸡心领羊毛衫、白衬衫、休闲西裤——这一套装束，花了谢智波千把元。

老谢家从没有花过这么多钱买衣服，就算过年给上高一的女儿买，也就是一套100多元的衣服。但这次，他觉得，他代表的是一群人，他要让自己显得庄重一些。

全国人大代表——这个“做梦都不敢想”的身份，将成为农民工谢智波接下来5年形影不离的“标签”。而在这之前，他只是福建省福州市一名环卫工人。

当上人大代表让老谢觉得自己有义务为同行发声。他用因十几年紧握扫把而变得粗糙的手，拿起笔纸，走访福州环卫工人，写下一份饱含切身体会的建议。建议中，他最希望向所有人呼吁：“不要乱扔垃圾，不要随意破坏共同的环境，尊重我们环卫工的工作成果。”

未来5年，如果这一呼声能赢得支持，人们的文明素质因此略有改善，城市面貌更好，环卫工不用干得那么辛苦，老谢便觉得“心满意足”。偶尔会上网的老谢知道，在不少城市都发生过环卫工因劝阻市民乱扔垃圾而被无视甚至被打骂的事情，这令他感到无奈。

老谢更多时候选择忍让，“我不喜欢跟人争长论短，你扔出来，我就都扫了就行了。你边吃瓜子边扔壳，我就跟着你扫”。

经常的忍让，让本来就老实的老谢一年年愈加沉默寡言，却在坚持中干出了成绩。4年前老谢就到过一次北京，那次，他被评为“全国优秀农民工”。但与这次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一样，惊讶之余，老谢情绪波动并不大，“我不太在意别人怎么看，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行”。

老谢一笑就会露出泛黄的牙齿，但这并不妨碍他更善于用表情替代言语，回答别人的问题。他的表情里，鲜有怒气。他在网上看到过广东有环卫工抱怨待遇低，他跟着生气；他有同事抱怨工作待遇，他还是埋头苦干。谈到一家四口在福州打工种种艰辛，他会突然加大嗓门“只要一家人在一起，苦点都觉得幸福”。

政府的难处，老谢很理解。“福州市环卫工人共有两万人。这么庞大的一支队伍，政府要一下子解决我们的问题，没那么容易，很难、也不可能实现。”

在两个月前住进宽敞的公租房之前，老谢觉得一家四口人住在14平方米的环卫工宿舍，也还可以，“至少基本生活有保障”。

但这不意味着老谢对未来改善环卫工待遇没有期待。城市乱扔垃圾的少了，就不需要那么多环卫工了。“环卫工少了，待遇自然就可能高了。”这正是他作为一名人大代表的期待。

本报北京3月4日电

3月4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首场新闻发布会上，本报记者李松涛第一个向傅莹提问。

本报记者 陈 剑摄